

对新的历史阶段非遗传承保护的思考

——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十周年之际

王福州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十周年。作为缔约国之一，自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以来，中国政府依据国情，以传承人为核心，以持续传承为重点，以保护文化多样性并促进各民族、社区、群体和个人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政府主导、民众参与、扎实推进，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传承保护新路。随着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持续深入，中国非遗保护已经从全民动员、普及推广，进入到科学管理、创新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重要节点上，有必要总结与反思我国履约10年来的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用《公约》精神关照当下非遗传承保护实践，为传承前人的智慧、赓续文化的薪火、丰富文化多样性，做出新的贡献。

贴近民众，走进年轻人心灵

10年来，中国政府重金举力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从田野调查开始，在立法、规划、指导和经费投入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步骤，直至颁布法律，全面激活了普通民众的保护意识。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是中国非遗传承保护的一个显著特点。通过深化非遗进社区活动，确认社区、群体和个人在非遗保护传承和整体管理中的作用，让非遗近距离贴近民众，促进不同社区间相互欣赏相互尊重；通过系列展演展销和节庆活动，让非遗深入群众生活，甚至为改善民众生活服务，增强非遗活力，活动效果可持续有后劲；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让非遗融入教育体系，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大学或专业院校设置的相关课程，让民众接触非遗、了解非遗、喜爱非遗。

让年轻人走进非遗，是非遗能否传承延续的关键。非遗既是草根文化又有经典国粹，通过宣传认识国粹的价值，通过参与体味传统的魅力，让非遗真正走入年轻人的心灵，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做。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表现为精神性、智慧性、技艺性的呈现形态，它与我们的精神、情感、思维、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比如民间文学中的三大史诗，作为典型的东方史诗区别于中世纪欧洲史诗和古希腊史诗，而自成一脉，比肩西方史诗，至今仍在藏族、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民众中以口传形式流传，生生不息并不断传承发展变异。民间艺人普遍文化不高，但记忆超群、学养丰厚，如被誉为“当代荷马”的《玛纳斯》歌手居素甫·玛依依能完整演唱八部《玛纳斯》，唱完23万行的《玛纳斯》需一年多时间。再比如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门类繁多，艺术内涵丰富，年轻人一时恐难真正走近，需要换个角度调整思路，从年轻人可能的兴趣点切入，告诉他们文化瑰宝就在身边，衣食住行无处不

在，祖先留下的财富须好好珍视。面对国粹经典，让传统文化展现新鲜感和独特魅力，让孩子们露出惊喜的眼神和感受发现的快乐，鼓励他们穿越时空与古人先贤对话，任凭他们去取舍去选择去评断。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拉近年轻人与非遗的距离，让非遗在年轻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动态管理，不可承载过重

以人为本的社会，必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无论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还是从多民族大家庭文化特点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共同构成传统文化基石。对非遗的认识必须是全方位的，各民族都有民间信仰，许多信仰并非儒道释文化所能涵盖。作为非遗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维系着族群的生存发展，传递着人们的信仰和习俗。文化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非遗作为中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就业与国计民生等都有推动作用，但切不可承载过重，否则将改变原来的味道、甚至变形走样并失去自我修复功能。

活态流变是非遗项目的重要特性，要求我们对传承人的认定和非遗项目必须实行动态管理。按照《非遗法》的要求，我国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实施了四级名录制度。对国务院公布的3批（121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文化部认定的4批（1986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分别建立了名录并实行动态管理。关注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活动和分布情况，着眼传承，及时递补，确保传承队伍充满活力。遵循非遗项目自身规律，及时更迭，落实保护单位和主体，确保每个濒危项目后面有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通过督查，有进有出、适时淘汰，使得名录管理更加科学、严肃、有效。

非遗项目的丰富性，决定了保护方式的多样性。实际工作中要求我们必须遵循非遗传承保护的规律特点，积极探索以生产性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多种传承保护方式，抢救性保护、原真性动态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并举，按照非遗自身衍变规律，对传统手工艺艺类项目，以及民间美术、传统医药类和饮食文化类项目尽可能寻求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传承发展，将非遗传承保护进一步向科学化进程推进，使项目分类更科学，行政管理更有针对性。

活态传承，不否定创新发展

非遗，作为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文化形态，最宝贵之处就在于活态传承。其中的每一个人既是传统链条上的继承者，也把个体的独特体验融入其中，成为新的创造者。非遗传承应以传承人为核心，以持续传承为重点，特别是

传承人在认真学习原有精髓的同时，以自己的思考和体验赋予非遗新创造，把千年文化与现代理念有机融合，产生既有传统特色，又融入文化内涵和现代元素的艺术精品，并借助良好的生产、销售、流通条件，打造良性传承链条，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生产性保护作为中国非遗保护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引起缔约国的重视。生产性保护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产生，以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通过税收优惠、信贷倾斜等措施，对传统工艺类和美术类等适合生产性发展的非遗项目进行扶持，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产品。生产实践中既保留传统工艺的本真，又将其文化内涵与技艺融入物态化产品中，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高超的传统工艺，又能充分利用其实用价值，将其融入现实生活中。除了要关注传承人的传承保护活动外，亦不可忽视其物质载体和相关文化空间。传统手工艺类和传统美术类等生产类非遗项目有其自身的规律，核心技艺要防止机器化和规模化生产，选徒带徒有其自身特性和要求，不可随意改变，但更不可使其凝固、静止、不发展，而是使其走上稳健、持久、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探索多姿多彩的非遗生产性保护之路。这些路径包括：多个非遗项目的综合性保护、单个项目的深度保护、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有效融合的生产性保护模式。

非遗保护不是仅仅为了留住历史，而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和技艺创造，生产性保护是实现活态传承的保证。通过近年来命名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研究基地的探索，理论引导和政策性示范作用增强，传统手工艺类、传统美术类、中医药炮制类和饮食文化类等适合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的自我造血机能增强，与旅游等文创产业的融合加深，传承人的传承条件和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

主动坚守，确保原汁原味

当下城镇化推进中的非遗传承保护是一个严肃而有挑战意味的课题。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包括建筑群落、桥梁、庙宇、祠堂，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商贸集会、节庆祭祀、信仰崇拜等民俗、神话、传说、谚语、歌谣等口头传统以及民间工艺、美术音乐、戏曲舞蹈等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原住民锐减，建筑文化消失，依附其上的乡村文化瓦解，原有的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渐渐逝去，活态传承面临挑战。

传统村落中留存着传统文化的 basically 是文化依托。无数原住民代以相

继、身体力行，优秀文化代代相传，铸就中华文化的基石。乡村文化、民族文化应该作为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保护，也体现出现代生活方式下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欣赏。然而，伴随城镇化和现代化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大批原住民离开村落进城打工，民俗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失去了传承延续的人群，在许多地方名存实亡。挖掘民俗文化内涵，维系其存在的文化生态、社会生态，显得迫切而重要。

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强调主动的坚守，需要毅力耐心更需要智慧，政府、学者和民间各有职责。政府在制定搬迁、复建规划时，应首先考虑非遗保护规划并使其融入当地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居核心地位。在前一阶段对古村落摸底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规划。同时，以建设乡村文化生态空间为重点，改善居住、生存和传承环境，保护好民俗文化空间，留下原住民，留住传承的本体。学者要走向田野，尽可能多地保存、抢救并记录传统村落遗物，将村头田边的文化遗存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升华为民族珍贵遗产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构成，把学术智慧转化为实践成果。民间社会作为传承保护的生力军，潜藏着无穷智慧，应充分挖掘并引导其对古村落实施多途径、多渠道、多方法的传承保护。

理性包容，强化国际间交流合作

自2001年5月18日昆曲艺术名列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始，10多年来，我国政府立足中国实际，以公约精神为指导，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代表作、急需保护濒危项目和保护实践示范项目最多的国家，受到国内外特别是缔约国的广泛赞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我国非遗传承保护由单一到整体，由零碎到系统，逐渐进入依法依规科学保护的新阶段。一方面，加强对周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认知，着力加强对现实及历史的深度观察和反思。遵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行做法，积极拓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就非遗传承保护展开联合申报和共同保护的探索，不再纠结于谁又要抢我们的申报项目。重建以包容理性、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和创新发展的保护实践，从根本上解决好申报轻保护的问题。对入选项目特别是急需保护濒危项目要建立专门的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严格履行兑现申报承诺。

（作者为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司副司长）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传统中国道德的重要信条。信守承诺，践行承诺，是对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能够守诺、践诺就是一种真诚。真诚的道德能量就来源于此。

重庆大街上的棒棒，他们穿行在高楼大厦间，游走在人潮中，承揽活计。在他们心中，都希望遇到更多的生意，能够挣到更多的钱。生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活的全部。尤其对那些生计困顿的棒棒们来说，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够揽到多一点的活计。郑定祥就是这些棒棒中最为普通的一员。棒棒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每次棒棒的工钱都不会很多，最低的时候只有5块钱。郑定祥还有卧病在床的妻子。他是多么希望多挣一些钱，赶紧把自己老伴的病治好。

面对这样的困境，郑定祥却没有失去自己对道德的承诺和坚守。当他与货主失散以后，并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自己把货物卖掉，而是选择了寻找和守候。14天的等待，物归原主，郑定祥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因为在他看来，人穷志不短。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最为底线的要求，也是多少年积淀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真诚的道德能量。

宋代有位儒生叫徐积。有一次，为了给母亲做饭，徐积上街路过一户卖肉的人家，心里想要买这里的肉，但是还需要去市场买其他的东西，他就暂时没有买。当他回



家时，却走了一条更为近便的路，也看到了一户卖肉的人家。他打算在这里买肉，因为这里更为方便。但此时他却突然自念道：我已经心许了开始那个卖肉的人家，现在改变主意，这不是欺骗我的初心吗？于是他又绕道回到原来那个卖肉的人家买肉。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吾之行信，自此始也。”也许我们会认为徐积是个迂腐之人，就像郑定祥那样。人们劝郑定祥卖掉那批找不到主人的货物，或者自己拿回家去用。但是郑定祥没有那样做，也许在他心中有着和徐积一样遵守自己最初承诺的真诚信念。

因为他遵守了自己最初的承诺，而且不因事态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真诚的道德能量在发挥作用。真诚的道德能量能够让我们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养成一种承诺践诺的习惯。真诚的道德能量能够使我们注重充实我们的内心，不让自己的心志受外在力量的影响，坚持做一个操守坚定的人。真诚的道德能量更是一种正能量，当这种能量在人际间传播时，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历史，使拥有真诚的人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生命活力。郑定祥脸上洋溢的笑容和轻松就是最好的见证。

艺舟双楫 文以载道

易明

近日，书法家李一的个人展览“艺舟双楫——李一书法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李一的真、草、隶、篆各体书法作品100余件。在展览的同时，李一书法讲座谈会也同时召开，来自书坛、美术界的理论家、艺术家们对李一的书法作品进行了分析点评。

“李一的章草古朴苍茫、深沉厚重，既合乎规范又有新意，可以称得上当代章草的楷模。”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胡抗美表示：“他在具体的笔画上没有照搬照抄古人的写法，而是为这种古老的书写形式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路、迈开了一大步。”

书法家刘正成介绍：“20年前李一开始研究章草，那时候章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后来出土的文献发现了西汉前的大量章草，我们的学者带头学习现代考古学的资料，复原了真正的章草的本相。李一在这条道路上给章草赋予了新的含义。”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则认为，李一书法上的成就并非偶然，而是由深厚的学术积淀而来。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在组织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中，吸收、领悟了很多学术上的精粹，将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此次展览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展出作品的内容多数为作者自己创作的诗词、手稿、书信、文章。针对李一这种书法和文学共融并茂、相得益彰的特点，莫言曾评论道：“他是生活在都市的乡下人，他是用毛笔写字的当代人，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但他的价值也在于此。”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评价说：“李一出生在圣人故里曲阜，也是书香门第，从小读诗、背诗、写诗。他出过多本诗集，诗写得很有特色。一个书法展全部用自己的诗作现在也是不多见的。”

此次展览中，作者首次发表的“论书绝句”，通过格律诗的方式点评了王羲常、萧娴、启功、高二适、赵朴初等数十位20世纪名家、大家及其书法。此外，大量的读书笔记、题跋等使得展览的形式与内容达到高度的契合；与王朝闻、黄苗子、冯其庸、沈鹏、王学仲、王伯敏、薛永年等学界前辈时贤往来信札、唱和、题词、手稿等，又勾连起书坛的一段段佳话。

美术史家、书画家陈绶祥用“惊讶”“振奋”来形容自己看过展览后的心情。

正如展览名称所言，中国的艺术从来都不是独木舟。李一深厚的文学基础提高了书法创作的艺术品

位，具有鲜明的文人色彩。书法永远是书法和文艺两部分共同构成的，有的人需要重点解决书艺问题，有的人需要重点解决文艺的问题。书家和画家都会面对这样一个过程，来提高我们的艺术格调。李一的书法展带给我们很多启发。”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说。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守安用“文化的自觉”来评价李一的书法：“这种‘文化自觉’是把中国书法当作文化而不是单纯的艺术来对待。其书法作品不再是单纯地展示点画的美丽与视觉的新奇感，而是更注重书写的文化内涵，追求的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体验与欣赏，不仅仅是书写技能。此次展览内容从信札、手稿到诗文乃至公文、立体、全面地展现了一个文人书法者的追求。”

此次展览的形式在近年来的书法展览中也是难得一见。传统的书法作品只是展品中的一个部分，大量“非主流”的形式为作者所广泛实验、采纳。作者别出心裁地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书法语言的介质——除各种纸张、扇面、花笺等传统介质外，更是把竹材、木板甚至树叶等都当作书法实验的载体，且取得脱俗的视觉效果，则更加显现出作者独运的匠心。此外，在展厅中展出的还有首次与观众见面的陶器、砚铭书法等，或系作者亲手参与制作，或系作者多年来精心之收藏，都与作者的艺术情怀融为一体。

美术史论家、书画鉴赏家薛永年评价说：“这些写在玉兰叶、团扇上的诗歌、书信、题跋等等，材料和内容都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生动地体现出艺术的实用功能与美学功能的统一，书写就是作者的生活方式。”薛永年认为，比起学科专业化培养出来的某些书法家写别人的文学作品、为展览而写的状态，李一书法展称得上是“生活的艺术，也是艺术的生活”。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认为，古代只要是写字的人都是写字法，所以古代出现大书法家是很正常的，大家的产生需要有普及性作为基础。“我们今天的书法家也不少，但真正从自己的生活、生命本体出发，从自己的情感和生活方式出发写字的不是很多，我认为李一的书法正是在随时、随处书写自己的生活。”

本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龙瑞，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等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烟雨楼上听万里涛声

——专家学者研讨贺敬之新古体诗创作

高 昌

孙东升

“烟雨楼上——听万里涛声/共唱——心船歌。”这是贺敬之1992年创作的《咏南湖船》中的名句。取此意结集的《心船歌集》，收入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歌近200首。近日出版的线装本《心船歌集》又增补了他近年创作的30首诗作，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不断创新探索、开辟新境的丰硕成果。

11月2日，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主办的“贺敬之同志新古体诗创作暨线装本《心船歌集》座谈会”在京举行，6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对贺敬之的新古体诗作品进行集中研讨。与会者认为，贺敬之晚年集中创作的新古体诗，有七言、五言、杂言、自度曲、绝句等。这些作品，说真话、抒真情，是情、理、象的融合，读来有情有味，不仅让人们受到精神上、思想上的陶冶、震撼、警醒、启迪，同时也得到了优美的艺术享受。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文化部原副部长郑欣森认为，贺敬之在自己长期的诗歌探索和创作实践中，始终保持着诗人的创作激情，用大量的新古体诗创作证明了中国传统的旧体诗歌需要发展，而且发展空间很大。反映新时代、新内容的旧体诗词生命长青、魅力

无限。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认为，贺敬之的再探索、再创新，使中国古典格律诗歌走进了信息化的新时代，走近了人民大众，从而赋予古老诗歌以新的生命。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贺敬之的关注和思考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表现了信念和思想的巨大力量。司法部原副部长、诗人岳义义认为，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歌创作，反映了他坚定的信念、开放的心态、忧国的情怀、历史的沉思、豁达的胸怀和飞扬的文采。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认为，贺敬之的探索是传统诗词“求容正变”的典范。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说，毛泽东在几封信和许多谈话中提出要创造“新体诗歌”，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就是这种新体诗歌的一种，其最具突破意义、最有个性的是表现新时代、新内容的“古体歌行”。这是贺敬之的探索和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大贡献。不过，他认为，新古体诗这个名字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如果再过一个历史时期，新古体诗的“新”字就会引起一些疑惑。

著名诗评家丁国成认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始终与国家命运和时代风

尚密切相连，他的新古体诗实际上从他新诗创作的辉煌时期即已开始了，只是到新时期以后才更加自觉。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艾斐认为，《心船歌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其中含蕴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情愫。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器友认为，《心船歌集》对“新古体”诗歌体式的探索，在“新诗”和“近体诗”之间，为汉语诗歌体式的建构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性。黑龙江大学教授丁毅说，贺敬之用他自己丰硕的创作实践，正式确立了“新体诗歌”流派的地位。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周兴俊认为，贺敬之是一位永不停步的创新型诗人。他的不同于近体诗的严律而采用的“宽律”，实际上是自觉地相对自由地遵循汉语言所特有的平仄声韵规律，是一种解放的“自由”，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也更加适合诗歌的普及和推广。著名诗人李树喜认为，从艺术样式角度看，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探索正是新诗的返璞归真，是对新诗驶入误区的一种矫正，即新诗应该不废传统，回到“大体整齐，基本押韵”的轨道上来。

黄冈师院教授张其俊认为，贺敬之晚年以一名文艺战线上“老兵”的战斗